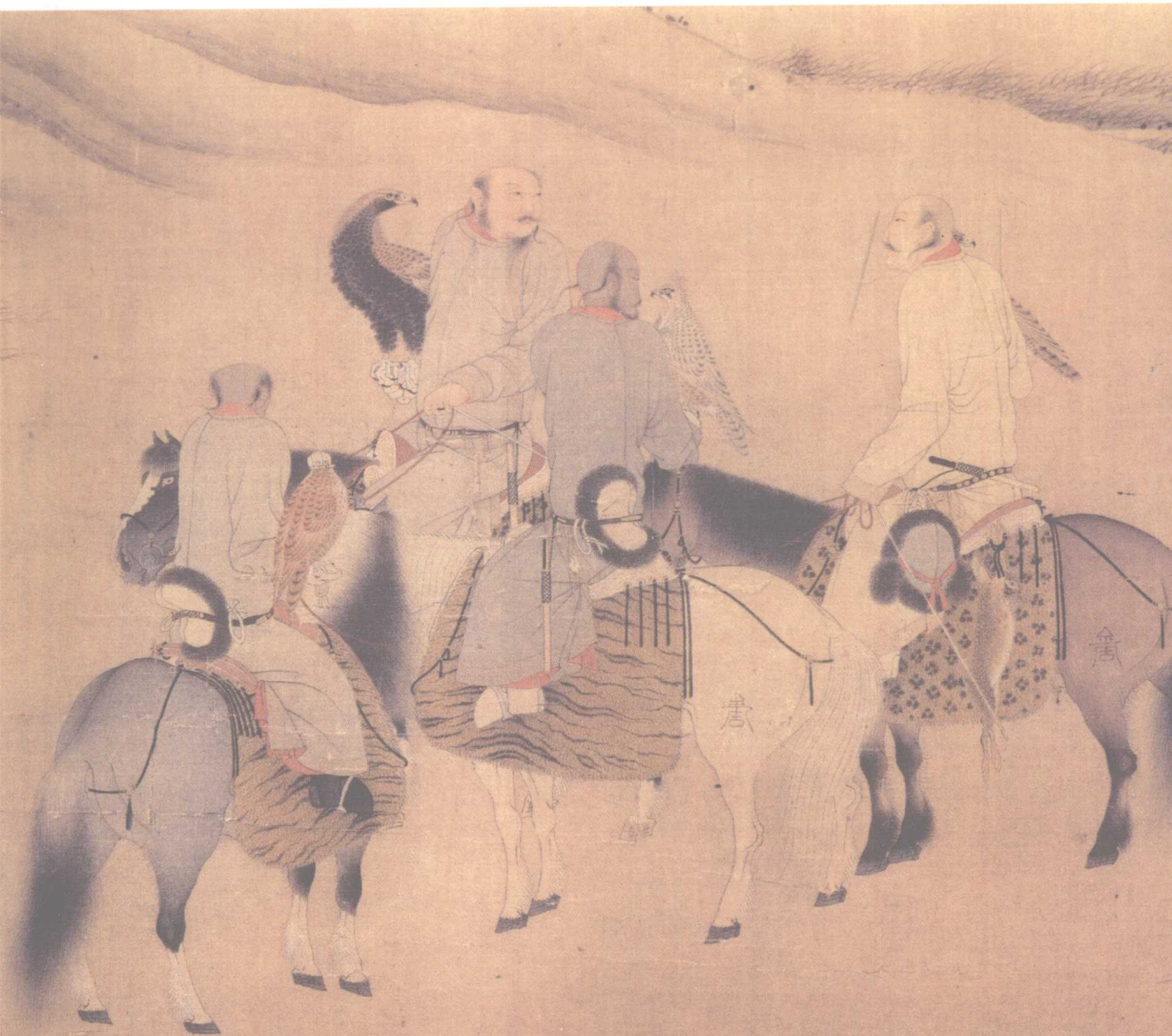


# 松漠之间

——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

刘浦江 著

中华书局



北大民族史文库乙种一号

松漠之间  
——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

刘浦江 著

中华书局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刘浦江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08. 7

(北大民族史文库)

ISBN 978-7-101-06163-5

I. 松… II. 刘… III. ①契丹—民族历史—中国—辽金时代—文集②女真—民族历史—中国—辽金时代—文集 IV. K28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71837 号

- 
- 书 名 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  
著 者 刘浦江  
丛 书 名 北大民族史文库  
责任编辑 王 芳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8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26¼ 插页 2 字数 450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6163-5  
定 价 68.00 元
-

# 自序

《松漠之间》一书，记录了我近十年来的学术轨迹。

我的辽金史研究最初是由金史入门的，自1990年代后期起，逐渐将研究重心从金史转向辽史和契丹史。这时我才深切地感受到民族语文对于辽金史研究的重要性。长期以来，辽金契丹女真史学界与民族语文学界彼此十分隔膜：一方面，辽金史研究者大都不能掌握利用契丹、女真文字资料；另一方面，民族语文学家又未能向历史学家充分展示这些资料在历史研究方面的价值。以至于有不少历史学家存在一种误解，认为民族语文资料对于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其实，就契丹大小字石刻对辽史、契丹史研究的潜在价值而言，如果能够对它们加以充分发掘和利用，其重要性将不亚于突厥语文之于突厥史、蒙古语文之于蒙元史。基于这种考虑，我不惜花费数年功夫去钻研契丹小字、契丹大字和女真字的石刻资料。今天看来，这一投入是非常值得的。

屈指算来，从事辽金史研究已近二十年。我总觉得，长期浸淫于一个学术领域未必是一件好事，当你对史实和材料越来越熟悉，出成果也越来越容易的时候，也许就快要陷入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泥沼了，那将意味着学术创造

力的枯竭。而要想避免这种结局,独立自我的问题意识是至关重要的。对于研究课题的选择,我向来有两个原则:一是追求重大题材,即关注重要的、关键的、核心的问题;二是追求难度系数,偏好难度较大的、前人没有发现或者未能解决的问题。因为一般来说,这样的研究课题具有更为恒久的学术价值。至于能不能申报什么项目,有没有经费资助,是不是当下学术界的热门话题,是否合乎国际汉学界的口味等等,则只好置之度外了。老实说,近年来我也时常为这些因素所困扰,虽不能完全超然于现行学术体制之外,但总是努力去抵御各种各样的诱惑。我非常向往的是那样一种学术环境,能够完全凭着学术的感觉去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研究课题,而不必有其他任何功利的考虑掺杂其间,这才是一个人文学者的最佳境界。

收在这部集子里的17篇论文,是从我近十年发表的作品中选出的部分篇什。因为篇幅的限制,内容严格限定为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除了与此主题无关者之外,还有两类文章没有入选,一是有关辽金史、但同时也涉及宋史的若干论文,二是我自己不甚惬意的某些文章。有的学者在将论文结集出版时,声称为保持原貌而不对文章加以改动,那样一来,岂不只是旧文的汇集重刊而已?我颇疑心这是懒惰的一个借口。后人编辑前人的论著,尽量保持原貌是可以理解的,但作者编选自己的文集,怎么可以一仍其旧呢?我有一个长年养成的习惯,在每篇论文发表之后,都会随时将所知所得记录下来,以备它日修改之用。因此需要说明的是,收入本书的论文都做了不同程度的修订,读者若想了解其原貌,尽可以去查阅原刊。考虑到某些论文篇幅很长,为方便读者计,每篇论文前均缀一内容提要,其中多数系直接采用初次发表时的提要,只有少数几篇提要是此次补写的。

在编选这部文集的过程中,高宇同学出力甚多。为尽可能减少本书的错误,书中引用的所有史料及研究论著皆由他逐一检核原文,其工作量之繁剧是可想而知的。本书之得以问世,有赖于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程郁缀、萧群部长的鼎力支持。中华书局于涛先生和王芳女士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本

书的出版质量提供了最重要的保障。以上诸端,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本书系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研究成果,并获得北京大学 985 工程(二期)出版资助,特此说明。

2007 年 8 月 15 日,于京西大有庄

# 目 录

自 序 .....	(1)
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 .....	(1)
辽朝国号考释 .....	(27)
辽朝“横帐”考	
——兼论契丹部族制度 .....	(53)
辽朝的头下制度与头下军州 .....	(73)
契丹族的历史记忆	
——以“青牛白马”说为中心 .....	(99)
契丹名、字研究	
——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父子连名制 .....	(123)
从《辽史·国语解》到《钦定辽史语解》	
——契丹语言资料的源流 .....	(177)

辽《耶律元宁墓志铭》考释 .....	(207)
“糺邻王”与“阿保瑾”	
——契丹小字《耶律仁先墓志》二题 .....	(219)
女真的汉化道路与大金帝国的覆亡 .....	(235)
金中都“永安”考 .....	(275)
春水秋山	
——金代捺钵研究 .....	(289)
金代“使司”银铤考释 .....	(329)
再论阻卜与鞑靼 .....	(343)
辽代的渤海遗民	
——以东丹国和定安国为中心 .....	(367)
《金朝军制》平议	
——兼评王曾瑜先生的辽金史研究 .....	(387)
李锡厚《临潢集》评介 .....	(401)
附 录 刘浦江学术论著目录 .....	(405)
后 记 .....	(411)



# 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

---

辽、金两朝在接受华夏文明之后，都以正统相标榜：辽承晋统，金承宋统，并企图为其正统论寻找德运的依据。蒙元一代，围绕着宋辽金三史的纂修义例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正统之辨。明代士人普遍否认辽金正统，纷纷重修《宋史》，其旨趣不在于订讹补阙，而在于另创义例。在清代，宋辽金正闰之争本当是一个颇有忌讳的话题，但当清朝统治者从北方民族王朝立场转向中国大一统王朝立场之后，最终也否定了辽金正统。辽金王朝的正统性之争，从一个侧面彰显了近千年来华夷观念的演变轨迹。

---

自秦汉大一统王朝形成以后，正统问题便成为中国传统政治学说中的一个永恒话题。一百年前，梁启超在《新史学·论正统》中总结出历代正统之辨的六项标准，其中之一是“以中国种族为正，而其余为伪也”<sup>①</sup>。辽、金王朝的正统性之争，自始就是与种族问题纠缠在一起的，它从一个侧面彰显了

---

<sup>①</sup> 《饮冰室文集》第3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1640页。

近千年来华夷观念的演变轨迹。

## 一 契丹王朝之正统论与德运说

辽朝虽然始终坚持草原本位,但自从燕云十六州汉地入辽后,文化的融合已是大势所趋。契丹人对汉文化的认同,一个明显的标志便是华夏正统观念的形成<sup>①</sup>。辽代前期,契丹人以“蕃”自居,自外于“中国”。辽朝人中国意识的觉醒,大致是兴宗以后的事情。自重熙年间起,辽朝开始以北朝自称。重熙二十一年(1052)遣使于宋,“其国书始去国号,而称南、北朝”<sup>②</sup>。道宗大康七年(1081)《萧孝恭墓志》,首行称“北朝大辽国……萧孝恭墓志铭”<sup>③</sup>。辽代中晚期石刻中,常见“南瞻部州大契丹国”<sup>④</sup>或“南瞻部州大辽国”<sup>⑤</sup>的说法。按照佛教的地理概念,中国属于四大部洲中的南瞻(瞻)部洲,郑樵说:“释氏谓华夏为南瞻部洲。”<sup>⑥</sup>唐宋石刻中以南瞻部洲指称中原王朝的例子比比皆是。辽人既自称为南瞻部洲,则是自比于华夏之邦。辽道宗的言行最足以说明契丹统治者从“夷”到“华”的文化立场的转变。道宗曾作有一首《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sup>⑦</sup>。《松漠记闻》卷上记述的一个故事更是常为人们津津乐道:“大辽道宗朝,有汉人讲《论语》,……

---

① 关于辽朝华、夷观念的演变过程,请参见宋德金:《辽朝正统观念的形成与发展》,《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年第1期;郭康松:《辽朝夷夏观的演变》,《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2期。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二,仁宗皇祐四年四月丙戌条。

③ 盖之庸编著:《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年,250页。又契丹小字《耶律仁先墓志》也称宋、辽为南、北朝,即实先生认为在契丹语中“南”亦有“下”之意,见氏著《谜林问径——契丹小字解读新程》,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年,233页。

④ 重熙四年《张哥墓志》、重熙十三年《沈阳无垢净光舍利塔石函记》、重熙十四年《沈州卓望山无垢净光塔石棺记》,分见《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200、237、239页。

⑤ 大安五年《萧孝忠墓志》、乾统七年《释迦佛舍利生天塔石匣记》,分见《辽代石刻文编》416、580页。

⑥ 《通志》卷三八《天文略一》。

⑦ 《辽史》卷二一《道宗纪》,清宁三年。又见王鼎《焚椒录》。

至‘夷狄之有君’，疾读不敢讲。则曰：‘上世獯鬻、桀纣，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卒令讲之。”这实际上就是金、元时代人所竭力张扬的“中国而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华夷观念<sup>①</sup>。契丹人传统的青牛白马故事反映了本民族根的意识，而道宗末年修成的耶律俨《皇朝实录》却“称辽为轩辕后”<sup>②</sup>，无疑是对华夏文化的明确认同。

五德转移说是华夏正统观的核心因子，辽朝的德运观念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咸雍元年(1065)《耶律宗允墓志》云：“我国家荷三神之顾諲，乘五运之灵长。”<sup>③</sup>但今存辽代文献中并没有关于本朝德运的任何记载。金章宗泰和间讨论德运问题时，秘书郎吕贞幹等人有“辽以水为德”之说<sup>④</sup>，这是目前辽、宋、金文献中有关辽朝德运的惟一明确的信息。冯家昇先生认为：“金章宗去辽未远，吕贞幹所云‘辽以水为德’，必甚可靠。”<sup>⑤</sup>除此之外，清代学者还曾举出一个新的论据，道光四年殿本《辽史》在卷五三《礼志》“腊辰日”条下有一段考证文字说：“按《五德运补》曰：‘辽以水德王。’又按《魏台访议》曰：‘王者各以其行，盛日为祖，衰日为腊。水盛于子，终于辰，故水行之君，以子祖辰腊。’按本《志》以辰为腊，可见辽用水德。”《五德运补》一书未见著录，估计是明朝人的著述，其“辽以水德王”的说法亦当源自《大金德运图说》。问题是“腊辰日”的记载是否能够证明辽为水德说？《辽史》卷五三《礼志六》“嘉仪·岁时杂仪”的原文是这样的：“腊辰日，天子率北南臣僚并戎服，戌夜坐朝，作乐饮酒，等第赐甲仗、羊马。国语谓是日为‘炒伍侖’。‘炒伍侖’，战也。”《辽史》卷五一《礼志三》“腊仪”条也有类似的记载。根据

① 见赵秉文：《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一四《蜀汉正名论》；杨奂：《还山遗稿》卷上《正统八例总序》。此语本出韩愈《原道》。

② 《辽史》卷六三《世表序》。

③ 《辽代石刻文编》，319页。

④ (金)佚名编：《大金德运图说》，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48册，313页。

⑤ 冯家昇：《契丹名号考释》，见《冯家昇论著辑粹》，中华书局，1987年，25页。

这些内容来看,腊仪很可能是契丹传统礼俗,以十二月辰日为腊,与五德终始说“水德子祖辰腊”<sup>①</sup>的说法不过是一个巧合而已。通检《辽史》,可以发现《太宗纪》会同八年(945)十二月已有“戊辰,腊,赐诸国贡使衣马”的记载,《礼志》则谓自穆宗应历元年(951)以后,以腊仪为常仪。要知道,在太宗和穆宗时代,辽朝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华夏正统观念,可见其腊仪与五德确实是没有关系的。

尽管“辽以水为德”说仅有金代文献中的一条孤证,但所幸的是,我们可以通过辽朝中后期的正统之争识破其中的玄机。大约从兴宗时代起,辽朝开始以正统相标榜。正统之争是由辽太宗得自后晋的所谓秦传国玺引起的。《辽史》卷五七《仪卫志三》曰:“会同九年,太宗伐晋,末帝表上传国宝一、金印三,天子符瑞于是归辽。”自秦汉以降,人们习惯上视秦之传国玺为正统王朝的象征性符号,“天下之人,遂以为帝王之统不在于道而在于玺,以玺之得失为天命之绝续,……而五季更相争夺,以得者为正统”<sup>②</sup>。辽朝前期因尚无华夏正统观念,据说曾打算将此传国玺送还宋朝,《后山谈丛》卷五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前世陋儒,谓秦玺所在为正统,故契丹自谓得传国玺,欲以归太祖,太祖不受,曰:‘吾无秦玺,不害为国。且亡国之余,又何足贵乎!’契丹畏服。”<sup>③</sup>辽朝中期以后,契丹统治者逐渐意识到这枚传国玺的价值,于是开始拿它大做文章:“圣宗开泰十年,驰驿取石晋所上玉玺于中京;兴宗重熙七年,以《有传国宝者为正统赋》试进士。”<sup>④</sup>据宋人记载,“仁宗朝,有使虏者,见虏主《传国玺诗》云:‘一时制美宝,千载助兴王。中原既失守,

① 王应麟:《小学绀珠》卷一“五运”,中华书局影印《津逮秘书》本,1987年。

② 郝经:《传国玺论》,《陵川集》卷一九,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92册,212页。

③ 这个故事又见于南宋陈櫛《负喧野录》卷上“秦玺文玉刻”条。按宋辽两国早在宋太祖开宝八年(975)已互通聘使,故此事应该是可信的。

④ 《辽史》卷五七《仪卫志三》“符印”。

此宝归北方。子孙宜慎守，世业当永昌。’”<sup>①</sup>这就是辽朝正统论的理据所在。

其实辽朝得自后晋的这枚传国玺实为晋高祖石敬瑭所铸，而并非真正的秦玺，宋人于此多有辨析<sup>②</sup>。周太祖广顺三年(953)二月，“内司制国宝两坐，诏太常具制度以闻”，太常寺所上奏疏对石晋传国玺的来历作了详细交待：

晋主奉表归命于虜主，遣皇子延煦等奉国宝并命印三面送与虜主，其国宝即天福初所造者也。延煦等回，虜主与晋帝诏曰：“所进国宝，验来非真传国宝，其真宝速进来。”晋主奏曰：“真传国宝因清泰末伪主从珂以宝自焚，自此亡失，先帝登极之初，特制此宝。左右臣僚备知，固不敢别有藏匿也。”<sup>③</sup>

由此看来，辽朝统治者对所谓传国宝的真伪理应是心知肚明的，但为了与宋朝争华夏之正统，不惜拿这枚伪玺大做文章。

这件事情给了我们一个重要启示，辽朝的正统论是建立在承石晋之统的基础之上的。金朝末年的修端明确主张：“辽自唐末保有北方，又非篡夺，复承晋统，……终当为《北史》。”<sup>④</sup>又《辍耕录》卷三引杨维禎《正统辨》，也有“议者以辽承晋统”的说法。若以辽承晋统为前提，上文谈到的辽朝德运就可以得到一个圆满的解释。在宋辽金时代，对五代以下各朝德运的通行解

① 孔平仲：《珣璜新论》卷四。此诗究竟出自哪位辽朝皇帝之手，并无明确记载，清周春《增订辽诗话》卷上、近人陈衍《辽诗纪事》卷一及陈述《全辽文》卷一均将此诗列在圣宗名下，《全辽文》有按语云：“宋仁宗当朝亘四十余年，历辽圣宗、兴宗、道宗三帝。辽主者，不得他证，未可必谓为圣宗也。谨附于后，用示存疑。”

② 参见王溥《五代会要》卷一三“符宝郎”、郑文宝《传国玺谱》（宛委山堂本《说郛》卷九七）及《玉海》卷八四引郑文宝《至道玉玺记》。另据宋人考证，真正的秦玺早已毁于汉末董卓之乱，自魏晋以下历代所称秦玺其实也都是伪玺，详见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一五、曹彦约《昌谷集》卷二二《玉玺本末》、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五“制作·宝玺”。

③ 《册府元龟》卷五九四掌礼部奏议二二，中华书局，1960年，第7册，7115页。据《宋本册府元龟》校正。

④ 修端：《辩辽宋金正统》，《元文类》卷四五，《四部丛刊》本。

释是:唐为土德,“朱梁篡代,……不可以为正统”,故列入闰位;后唐“中兴唐祚,重兴土运”;此后石晋为金德,刘汉为水德,郭周为木德,赵宋为火德<sup>①</sup>。辽朝既以承晋统为其正统论之理据,必定自认代石晋金德为水德,这样就等于否定了宋王朝的正统性,使宋之火德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基于这种考虑,我相信金人所称“辽以水为德”确是事实,尽管由于辽代史料极度贫乏,我们今天已经看不到辽朝人关于本朝德运的第一手记载。

对于辽朝的正统论,宋人肯定是不屑一顾的。欧阳修《新五代史》将辽朝打入《四夷附录》,曾引起辽人极大不满<sup>②</sup>,这就是宋人的华夷观念。澶渊之盟后,宋人甚至对两国往来国书互称南、北朝都不能接受:“始,通和所致书,皆以南、北朝冠国号之上。将作监丞王曾言:‘古者尊中国、贱夷狄,直若首足。二汉始失,乃议和亲,然礼亦不至均。今若是,是与之亢立,首足并处,失孰甚焉。狄固不可启。臣恐久之非但并处,又病倒植。愿如其国号契丹足矣。’上嘉纳之。”<sup>③</sup>虽然澶渊之盟规定两国皇帝以兄弟相称,但宋人骨子里始终视辽朝为夷狄之邦,岂能容忍与之“首足并处”?仁宗皇祐四年(1052),辽朝遣使贺乾元节,其国书“称北朝而去契丹号”,宋人认为辽朝“意以自尊大”,亦托辞拒绝<sup>④</sup>。

自金代以后,对辽朝的正统性普遍持否定态度。在《大金德运图说》所列历代王朝德运图中,根本就没有辽朝的位置;同书引章宗泰和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尚书省上奏说:“辽据一偏,宋有中原,是正统在宋。”关于金人的宋辽正统观,下文将作出具体阐释。

① 参见《宋会要辑稿》运历一之一、《册府元龟》卷四帝王部运历门、王应麟《小学紺珠》卷一“五运”、金佚名编《大金德运图说》。

② 见《辽史》卷一〇四《文学下·刘辉传》。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五“亲征契丹”,据《长编》卷五八景德元年十二月辛丑条校正。但《长编》辑本已将王曾语删去大半。

④ 张方平:《乐全集》卷三九《昌黎韩公墓志铭》。此事始未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二仁宗皇祐四年四月丙戌条。

## 二 金朝的德运之争及其文化选择

金王朝的建立者“生女真”原本是文明程度较低的一个部族，被宋人称为“夷狄中至贱者”<sup>①</sup>。女真人主汉地之初，尚无华夏正统观念。自熙宗改制后，金朝迅速走向汉化道路。到了海陵王时代，女真统治者已经具备中国大一统王朝的政治伦理观念<sup>②</sup>。

五德终始说自秦以后成为讨论历代王朝正统性的理论基础和对话平台，而金朝则是最后一个试图通过“五运”说以寻求其政权合法性的王朝<sup>③</sup>。德运之争是金朝历史上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问题，陈学霖先生已对此做过专题研究<sup>④</sup>，但仍有许多问题值得继续探讨。首先，在章宗泰和二年（1202）改定土德之前，金朝究竟奉行什么德运，就有几种不同说法。从金朝官方文献的记载来看，泰和二年以前毫无疑问应是金德。世宗大定十五年（1175）册封长白山册文云：“厥惟长白，载我金德。”<sup>⑤</sup>章宗时讨论德运，翰林学士承旨党怀英主张“宜依旧为金德”<sup>⑥</sup>。宣宗朝再议德运，应奉翰林文字黄裳说：“泰和之初，……改金为土。”<sup>⑦</sup>

那么，金朝究竟是从何时开始奉行金德的呢？泰和初，刑部尚书李愈说：“本朝太祖以金为国号，又自国初至今八十余年，以丑为腊。若止以金为

①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四引张棣《金虏图经》。

② 关于金朝正统观念的形成过程，宋德金先生已有详细论述，参见氏著《正统观与金代文化》，《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

③ 参见刘复生：《宋代“火运”论略——兼谈“五德转移”政治学说的终结》，《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

④ Hok-lam Chan, *Legitimation in Imperial China: Discussions under the Jurchen-Chin Dynasty* (1115~1234),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4; 陈学霖：《金国号之起源及其释义》，《辽金史论集》第3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大宋“国号”与“德运”论辩述义》，载《宋史论集》，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3年。

⑤ 《大金集礼》卷三五“长白山封册礼”，《丛书集成初编》本。

⑥ 《大金德运图说》载贞祐二年正月二十二日《尚书省判》。

⑦ 《大金德运图说》载贞祐二年二月《应奉翰林文字黄裳议》。

德运，则合天心、合人道、合祖训。”李愈以“大金”国号附会金德，当时即已遭到有力反驳：“李愈所论太祖圣训，即是分别白、黑之姓，非关五行之叙。”<sup>①</sup>也就是说，太祖称帝时所谓“金之色白，完颜部色尚白”云云，是指白号、黑号之姓而言（完颜部属白号之姓），与德运无关。李愈又谓“自国初至今八十余年，以丑为腊”<sup>②</sup>，这一说法也得不到史料支持。据我了解，金代文献中有关金德的消息最早见于世宗朝。大定三年（1163）十二月丁丑，“腊，猎于近郊，以所获荐山陵，自是岁以为常”<sup>③</sup>。这就是“以丑为腊”的最早记录。其实，不仅我们今天看不到有关金德的更早记载，就连金人也没有金朝前期奉行金德的文本依据。宣宗朝再议德运时，赞成金德说的右拾遗田庭芳认为：“向来以丑为腊者八十余年，应是当时已有定论，后疑失其文本，不得其详尔。”<sup>④</sup>头一句话乃是拾李愈之牙慧，后面的疑似之词才透露了实情，原来主金德说者对金德的渊源也“不得其详”。须知在完颜阿骨打建国之时，女真人根本就没有华夏正统观念，怎么谈得上德运之说呢？

有证据表明，直至海陵王时代，金朝尚未确定其德运所尚。清人辑本《大金德运图说》，最后有一通《省奏》云：

尚书省奏：“准尚书礼部举，窃闻王者受命开统，皆应乎五行之气，更王为德。方今并有辽、宋，统一区夏，犹未定其所王。伏睹今来方以营造都邑并宗庙社稷，窃恐随代制度不一，有无委所司一就详定。”奏讫，奉圣旨：“分付详定，须议指挥。”右下详定内外制度仪式所，可照检依准所奉圣旨详定讫，分朗开立状申，以凭再具闻奏施行，不得住滞错失。付详定所。准此。

《金文最》卷五六收录此文，改题为《集议德运省劄》，并注明“贞祐二年”。陈

① 《大金德运图说》，贞祐二年正月省判引泰和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尚书省奏。

② 按金德以丑日为腊。《太平御览》卷三三引《魏台访议》云：“金始生于巳，盛于酉，终于丑。故金行之君，以西祖丑腊。”

③ 《金史》卷六《世宗纪上》。

④ 《大金德运图说》载贞祐二年二月《右拾遗田庭芳议》。



学霖先生认为,这份省奏可能是贞祐二年(1214)德运论辩之初呈给宣宗的<sup>①</sup>。我觉得这一结论还值得斟酌。据我判断,此段文字不应该是《大金德运图说》的原文。《大金德运图说》收录的是宣宗贞祐二年讨论德运的档案材料,系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而根据以下三点内容,可以完全排除这份省奏作于贞祐二年的可能性。

第一,如上所述,金朝德运之确定,最迟不晚于世宗大定三年,而省奏谓“方今并有辽、宋,统一区夏,犹未定其所王”,则显然是世宗以前的口气。

第二,“伏睹今来方以营造都邑并宗庙社稷”句,对于确定该省奏的系年很有帮助。贞祐二年宣宗迫于蒙古的军事进攻而临时决定迁都南京,是一个非常仓促的行动,根本来不及进行土木建设;况且宣宗南迁在当时被称为“巡幸南京”,金朝政府从不承认迁都南京的事实,按照官方的说法,南京只是“行宫”而已,故“营造都邑”肯定不是指营建南京。至于金朝前期的国都上京会宁府,规模相当简陋,从未进行过认真的“营造”。惟有海陵王迁都之前曾对新都燕京城进行过大规模建设,时在天德三年至贞元元年(1151—1153)。

第三,省奏提到的“详定内外制度仪式所”也有助于判断其大致年代。此官司在《金史》中缺乏明确记载,仅见于《大金集礼》卷四〇“朝会”门:“天眷二年五月十三日,详定内外制度仪式所定到常朝及朔望仪式。”又皇统三年(1143)《时立爱墓志铭》云:“特进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太常卿修国史详定内外制度仪式上柱国郇国公食邑三千户食实封三百户臣宇文虚中奉敕撰。”<sup>②</sup>据此判断,详定内外制度仪式所应是熙宗天眷改制时创建的一个机构,估计至海陵初仍然存在。

综上所述,我认为这份尚书省奏当作于海陵王天德三年至贞元元年间,被四库馆臣错误地辑入了《大金德运图说》;至于它原来出自《永乐大典》所

<sup>①</sup> *Legitimation in Imperial China*, p. 169.

<sup>②</sup>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新城县北场村金时立爱和时丰墓发掘记》,《考古》1962年第12期。